

中國情懷

余英時自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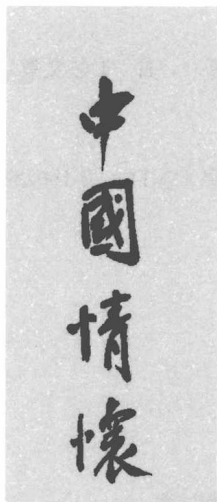
——  
余英時散文集

余英時作品系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余英时作品系列



——  
余英时散文集

彭国翔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情怀: 余英时散文集 / 余英时著; 彭国翔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4

(余英时作品系列)

ISBN 978-7-301-19519-2

I . ①中… II . ①余… ②彭… III .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0288 号

书 名: 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

著作责任者: 余英时 著 彭国翔 编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519-2/K · 08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mailto:pkuphilo@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38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余英时作品系列”

---

## 自序

---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一般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余英时

2012年2月1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 中國情懷 | 目錄 |

## 1 价值篇

- 中国近百年价值观的变迁（1993） / 3
-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1999） / 15
- 恢复人类文明的元气（1999） / 22
- 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2000） / 24
- 晚节与风格（2001） / 28
- 容忍与自由（2002） / 30

## 33 文化篇

-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1981） / 35
- 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1985） / 45
- 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1985） / 54
- 论文化超越（1990） / 64
-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 79

## 89 历史篇

-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 / 91
- 史学、史家与时代（1973） / 103

- 中国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动力（1995） / 123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2005） / 130  
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2007） / 153

## 167 士人篇

道统与政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1980） / 169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991） / 196

商业社会中士人精神的再造（1999） / 206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

——刘再复《西寻故乡》序（1996） / 214

## 221 儒学篇

儒家君子的理想（1985） / 223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1985） / 244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995） / 252

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 / 260

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2006） / 265

## 269 读书篇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1958） / 271

古典与今典之间

——谈陈寅恪的暗码系统（1984） / 283

怎样读中国书（1990） / 293

记吴宓的“殉道”精神（2003） / 299

书中乾坤大（2004） / 303

## 307 坐隐篇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吴清源《以文会友》读后（1986） / 309

“欲超胜负入中年”

——林海峰纽约名人战记感（1998） / 314

“殿上垂裳有二王”

——为王立诚、王铭琬的围棋成就而作（2000） / 318

境界与平常心（2001） / 326

## 335 母校篇

为“新亚精神”进一新解（1974） / 337

我对于新亚校友会的期望（1975） / 341

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2000） / 344

新亚书院纪念碑铭（2009） / 356

唐君毅先生像铭（2009） / 358

## 359 自述篇

我的中国情怀（1985） / 361

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1988） / 366

我走过的路（1995） / 370

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追索

——克鲁格奖演说（2007） / 378

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2008） / 383

## 399 编后记

中國情懷 | 價值篇 |







# 中国近百年价值观的变迁 (1993)

## 前言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变动的历史阶段；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这一百多年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另一方面也看到种种现代观念的出现，例如今天在西方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所谓“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别便和价值系统的问题密切相关；同一价值观念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层面中并不必然发生相同的作用。由此可知，如果我们要认真讨论中国的价值系统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的变迁，似乎只有在社会科学家和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以后才能着手。但自 1949 年以来，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停顿。少数调查报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开始的，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是以本文仅从思想层面进行探讨，这是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全面攻击是从知识界、思想界开始的；第二、由于中国许多知识人都是从民间来的，因此他们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向；第三、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国知识人在阐明 (articulate)、维护和传播文化价值方面，则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

## 一、19 世纪中叶的反儒教思想运动

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形成的，汉代以后有佛教和道教的崛起，许多民间的价值观念往往依托在佛和道的旗帜之

下。但从整体地看，儒家的中心地位始终是很稳固的。因此传统价值系统的动摇，也始于现代知识人对儒家逐渐失去了信心。

我们通常认为儒家的权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战。然而就起源而言，我们却不能不把中国的反儒教的运动上推至 19 世纪中叶。洪秀全等人信奉拜上帝会而到处焚毁孔庙及其他寺庙，并禁士人“读孔子之经”；这可以代表中下层社会的边缘分子对于儒教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一种激烈的反抗。这一规模浩大的民变也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

西方势力的人侵不仅在中国中下层边缘分子的心灵中造成巨大的激荡，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对儒家发生深切的怀疑。太平天国时代的汪士铎（1802—1889）便是一个较早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士铎亲历太平天国之乱，陷身江宁差不多一年，但后来曾入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幕府，颇多策划，极受胡、曾的推重。所以胡林翼说他“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营八极”，又说他是“旷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视”。曾国藩也称道他“学问淹雅，人品高洁”（均见邓之诚《汪梅翁乙丙日记·序》所引胡、曾书札）。然而这位“醇儒”却对儒家有很激烈的评论。他在《乙丙日记》中说：

由今思之，王（弼）何（晏）罪浮桀、纣一倍；释、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张罪浮百倍。弥近理弥无用，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似桀、纣，乱只其身数十年也。周、孔贤于尧、舜一倍；申、韩贤于十倍；韩、白贤于百倍。盖尧、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于仁柔，故申、韩以惩小奸，韩、白以定大乱，又以立功胜也。（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 94—95）

他对孔子还保持着敬意，对孟子已多微词，对宋代道学则深恶痛绝。

汪士铎排斥道学并不是出于无知。事实上，他出身于理学的家庭。据他的《自述》：“士铎家极贫，然性好读书。先君子好理学，

除程、朱经注之外禁勿观。日以无入不自得为训。”（《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二，文海影印本，页493）我们可以断定，他中年以后，思想的偏激是经历了世变的结果。西方势力的凌逼和太平天国的动乱使他认识到富国强兵已成当务之急，因此他才特别提倡法家与兵家。

依照汪氏的推理，只有“经世”才能致富强，因此法家和兵家反而能够“辅孔子之道”。这里透露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动向。19世纪上半叶，政治、社会的危机已深，学者开始回向儒家的经世传统，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1826）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世学运动的始点。魏源强调“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他一方面讥刺宋儒说：“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见《默觚下·治篇一》，收在《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页36—37）另一方面则正面提出“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默觚下·治篇三》，页45）这些都是汪士铎在《日记》中所发挥的议论，不过语气更为偏颇而已。

19世纪中叶以后，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不但魏源、包世臣等学人倡导不遗余力，政治界的领袖如曾国藩、胡林翼等也为之推波助澜。“经世”虽然一方面出于儒家的内在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儒家在“治国、平天下”层面的限制。

然而晚清的经世运动和过去有一大不相同点，即通过变法改制而逐步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旧格局。从这一点看，汪士铎在经世思潮初兴之际便对儒家展开强烈的批评，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汪士铎的批评虽以“治国、平天下”为限，但后来的发展说明：这个缺口打开之后，中国知识人对儒家价值系统的整体信仰便开始动摇了。

## 二、“戊戌”前后对儒家价值系统的冲击

戊戌变法前后，儒家的价值系统第一次受到比较全面的挑战，康有为的改制虽假孔子之名，其实是以西方的政俗为蓝图。使西

方的价值取儒家而代之。这是当时人所说的“用夷变夏”；但最先向儒家价值系统公开发难的是谭嗣同。

他以西方的政教风俗为根据（其中尤以基督教的灵魂观为理论上的枢纽）以否定中国传统的伦常秩序。这是一种相当透彻的现代文化批判，也是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滥觞，如在著名的《仁学》中对传统的“名教纲常”的尖锐批判正是他对“三纲”所造成的残酷社会状况提出了极其沉痛的控诉。

据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拘谨”的“礼法之士”（《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廿七日条），谭嗣同因此便成了名教纲常下的牺牲品。可见谭嗣同“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早契机起于个人生命上的实感。而且这里也早埋下了他后来选择殉难的种子。但是他超越了个人的痛苦，把这个深刻的感受扩大、提升到宗教的境界——即他所说的“仁”。所以他终于把一己的“纲伦之厄”认同于整个中国的危亡，而走上了“杀身成仁”的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仁学》虽已全面攻击儒家的名教纲常，其重点则是君臣一纲，这是因为作者深信“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的缘故。还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谭氏把儒家“伦常之网罗”归罪于荀子，甚至提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的论断；至于孔子的原始教义，他则说成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这些看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另一问题，但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又是他和五四时代的文化批判者有所区别之所在。无论如何，谭嗣同的纲常批判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破天荒之举，其意义的重大是无可否认的。

《仁学》在清末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在一般的伦理观念上，而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换句话说，《仁学》动摇了人们对于君臣一纲的信念，但似乎还没有冲击到整个纲常的系统。十几年后，中国之所以能够那样轻而易举地废除了帝制，在思想上不能说不是得力于《仁学》的传播。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他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合成《新民说》。《新民说》的宗旨是要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来补充和刷新中国的旧伦理，以造成独立、自由、自尊的新人格。用最简单的话说，“新民”是以西方的“公民”为范本而发展出来的新概念。和谭嗣同不同，他不再与三纲五伦相纠缠，而直截了当以宣扬新伦理为己任。所以他首先强调“新民”必具“公德”的观念，并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新民说》不但对“不失自主之权”的现代人作了极其详细的描述，而且确实改变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新民丛报》时代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发挥了最大的影响的时代。

后来胡适显然是沿着梁启超所开辟的道路，向前再跨进了一步。不过以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言，这却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踏出了这一步，胡适才能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崭新命题。

### 三、五四时代中国价值系统全面变动

中国的价值系统发生全面的变动是在五四时代。它是谭嗣同“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实践，也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进一步的发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一六年》文中首先揭橥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一项大原则，文中摧破三纲和提倡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的三纲批判远比谭嗣同为透彻：第一、他把三纲溯源至“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非像谭氏那样从今文经学的立场上为孔子开脱。第二、他的批判重心不再停留在君臣一纲上，而是更重视父子和夫妇两纲。第三、他提倡个性的解放。并借用尼采“奴隶道德”与“主人道德”的概念以区别中国的三纲和西方的个人自主。他对于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也因此而充分显露出来。据我所知，陈独秀好像是现代史上正式提议以“个人本位主义”来取代

“家族本位主义”的第一人。从他对家族制度的严厉攻击，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三纲批判是以父子、夫妇两纲为重点的。这正是五四时代反儒家的主要倾向，同时也是共同倾向。

《新青年》反儒家的火力集中在家族制度和妇女解放两大问题上。除了陈独秀本人的文字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吴文则要直接摧破《论语》中关于孝弟的理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便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近儒家经典的核心了。从第二卷第六号起，《新青年》又开辟了“女子问题”的专栏，提出有关妇女解放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例如吴虞的夫人吴曾兰女士便在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女权平议》一长文，以后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女子问题》、周作人译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和唐俟（鲁迅笔名）的《我之节烈观》等。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青年》攻击家族制度和倡导妇女解放可以说是继续并完成了谭嗣同所提出的“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命题。所以从《仁学》到《新青年》，其间贯穿着一条内在的理路。这就是说，五四反纲常名教的运动在社会现实的根据之外，同时还有思想史的根源。我们之所以能这样断定，是因为五四一代的思想领袖在传统批判方面仍没有完全脱出《仁学》的典范。但五四确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因为文化的各方面恰好都在发生变化，而且互相支援。从1918年起，白话文开始风行，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当时青年一代的心理上所激起的震荡，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了。鲁迅用新文学的笔触揭露纲常名教的残酷性的一面，其感人的力量远比陈独秀、吴虞等人的正面攻击为深切。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之后也深受感动，特别在1919年8月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举出中国史上许多记载来证实鲁迅的控诉。从此“礼教吃人”便成为五四时代一个最著名的口号了。《狂人日记》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的是“吃人”两个字，这句话的含义却已远远超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而笼罩了全部中国文化的传统。所以客观地说，

五四反传统的基调是在鲁迅的笔下奠定的。

白话文学扩大了五四时代的纲常批判还可以从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孟真）、罗家伦等所创办的《新潮》月刊（1919年1月创刊）得到印证。这是一个全部用白话文为媒介的杂志，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运动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潮》在攻击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勇猛激烈可以从傅斯年在创刊号发表的《万恶之原》见其一斑。傅斯年的基本论点是以一切“善”都从“个性”发出来，而中国的家庭则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所以是“万恶之原”。这篇文章是很有影响的。同年（1919）7月13日李大钊便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万恶之原》的短评，作为一种呼应。他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甚至迟到1951年熊十力还在用力地发挥这一论点。

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儒家——这是中国20世纪三个互相排斥的思想流派——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万恶之原”，这也许要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由此可见五四反传统的影响之大，中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念真正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以《新青年》和《新潮》为中心的文学革命和纲常批判终于激起社会上守旧派的反击。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除刊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篇报道外，还刊出了那篇最有名的《林琴南致蔡子民书》。林纾对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提出了两点最严厉的指责：第一、“覆孔孟、铲伦常”；第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的《答林琴南书》对这两点都作了有力的反驳。蔡氏的答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 四、传统伦理秩序的解体

林纾的愤怒起于他深信北京大学师生“覆孔孟、铲伦常”之举



足以败坏人心，使“中国之命如缕丝”。从此以后，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旧道德，几乎成了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看法。

但是传统伦理秩序的解体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不尽出于思想的影响，而且早始于五四之前。但这并不是否认五四在这一方面的巨大作用。根据历史资料，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作用比较具体地归纳成两点：第一、19世纪末叶以来，许多人早已在思想上或实际生活上不断冲击着名教纲常的堤防，造成了一些缺口，但整个堤防依然存在。五四新思潮的作用则是把这个堤防全面冲破了。第二、五四新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使反抗名教纲常完全合法化了。在五四以前，反抗名教纲常的事件也时时有之，但反抗者的下场照例是很悲惨的，他们从此在社会上为人所不齿。五四以后则不同了，反抗者所得到的同情远比谴责为多，而且同情的一方代表了正流，谴责的一方则成了逆流。

五四对于名教纲常的冲击自然是巨大的。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爆发以后，半年之内中国便出版了四百种白话报刊。新思潮因此也传布到全国各地。中国小学正式有男女同学和大学招收女生也都是在五四以后才开始的。民国十一年（1922）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外，已有665人。这是五四时代提倡“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成就。（参看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页387—392）。

但是以中国之大，五四新思潮究竟冲击了多少传统的大家庭，以致导发了“家庭革命”，则至今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其次，大概靠近交通要道的农村中的乡绅地主家庭也不免受到波及，如果他们子女在城市读书的话。至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们还不知道有过受五四影响而发生“家庭革命”的实例。小说家、戏剧家写暴露大家庭黑暗的作品也都是以中上层社会为背景。而且即使是中上层的社会，也并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萧公权的经验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他